主题栏目:“东亚学”与“汉文化”研究

DOI: 10.3785/j.issn.1008-942X.2011.05.131

主持人语:世纪之交,中华升腾,亚洲崛起。随着东亚经济圈渐具雏形,“东亚共同体”蓝图呼之欲出。在此背景下,国内外有识之士开始勘探历史脉络,梳理文化情结,为了建造面向未来的政治经济大厦,苦苦寻觅自古有之的传统基盘。诸说纷纭之中,“东亚学”应运而生。

自从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类“东亚”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然对“东亚”含义却各自表述。研究制度的,用“册封体系”框定;研究经济的,以“朝贡贸易”筛选;专事儒学者,划界至朝鲜、日本、越南;浸润佛学者,添加印度、尼泊尔;在国际关系分野,蒙古必在其中;在政治外交领域,南亚诸国榜上有名。

所谓“东亚”,并非无边无际;外延虽然伸缩流动,核心则凝聚于中华。就中国言之,华夏文明先点状传播,再串点成线,继而网线环绕为面;在此过程中,化个性为共性,弃小异存大同,造就共同的文化圈。从域外观之,先接受汉字,再使用汉语,继阅读汉籍;在此过程中,由模仿而扬弃至创新,催生出大量“域外汉字”、“域外汉语”、“域外汉籍”。

华夏文明经时间上传承和空间上流播,兼容并蓄成一庞大体系,已非昔日面目,不再拘囿于“国学”。以“汉字”为例,在中国语境中,古义指“汉代文字”;梵字随佛教传入,衍化出“中国文字”义项;又随契丹、蒙古、满清等少数民族文字出现,再引申出“汉族文字”义项。在域外语境中,日本假名出现后,“汉字”专指“中国文字”;用“六书”规范创造众多“国字”后,则指称“中国汉字”;朝鲜的“吏读”、越南的“喃字”,也有类似情况。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域外原创的一些汉字、汉语、汉籍已经融入中国文化,故而只能置之于“东亚”,方可穷尽其内涵与外延。这便是“汉文化”存在之证据,亦是“东亚学”成为学科之基础。

“东亚”一词,并非亚洲人自创。“东”意译自“East”,“亚”是“Asia”音译词“亚细亚”之略语,故而是个“意译+音译+省略”的特殊外来词。西方对东方的研究,起始于“Orientalism”,据萨义德《东方学》的说法,此词蕴含对“非欧世界”的贬义。然而,起源于古代腓尼基或亚述一带的“Asu”与“Ereb”,本义指“日出处”(东方)与“日落处”(西方),其后演化为英语的“Asia”和“Europe”,因而不再含有以往那般严重偏见。

“东亚学”在欧美是一门比较成熟、已经定型的学科,但它毕竟是从国别研究进化而来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无法完全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主观羁绊。目前在亚洲脱颖而出的“东亚学”,基本上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当可面向未来自主擘画。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窃以为其要有二:以中国为基点,追踪汉文化之传播和影响,彰显华夏文明的世界意义;以域外为起点,考察对中国文化之摄取与模仿及创新与回馈的机制,拓展“汉文化”的文明内涵。

本专题所收的三篇论文,分别从汉语词汇与域外汉籍的角度,追踪“汉文化”在东亚环流之轨迹,希冀为构架“东亚学”略尽绵薄之力。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北京大学王勇教授

从“汉籍”到“域外汉籍”

王　勇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在现代文献中,“汉籍”一词出现频率颇高,却罕有辞书收录之。学界均以“汉籍”指称中国典籍,然此义项非中国固有。在中国语境里,扬雄《方言》最早使用“汉籍”,尔后从魏晋至隋唐,再经宋元至明清,汉籍即“汉代典籍”之义项传续有千余年。在日本文脉中,“汉籍”相对“国书”而言指中国书籍,相

[**收稿日期**]2011-05-13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1-10-2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5JJD740187)
[**作者简介**]王勇,男,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古代史、东亚文化交流史研究。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对“和书”则泛指汉文典籍,又相对“佛书”专指儒学经典。现代汉语中的“汉籍”既传承古汉语基因,又吸纳日语词血液,熔铸出一个新词——不仅包括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还涵盖佛经及章疏乃至简帛、碑刻、尺牍、图赞之属。当今方兴未艾的“域外汉籍”研究,论者各自定义、随意取舍,呈现种种乱相。若从“汉籍”乃中华文明结晶推演,“域外汉籍”应定义为凝聚域外人士心智的汉文书籍,是在中华文明浸润下激发的文化创新,构成东亚“和而不同”的独特文明景观。

[**关键词**]书籍之路;和制汉语;和而不同;和刻本;“域外汉籍”

From "Chinese Classics" to "Overseas Chinese Classics"

Wang Y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term "Chinese classics" appears frequently in modern literature, but few dictionaries have included it as an entry. In the academic world, "Chinese classics" is usually used to refer to classics of China, but this term is not what it has always been in histor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Chinese classics" first appeared in Yang Xiong's *Fangyan*. For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after that, from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rough Sui, Tang, Song, Yuan, Ming to the Qing dynasty, the term meant "the classics of Han dynasty". In the Japanese context, when used in comparison to "Japanese classics", "Chinese classics" refers to Chinese books; when used in comparison to "washo (Japanese books)", it refers to classics written in Chinese; and when used in comparison to "Buddhist books", it refers to Confucian classics. In modern Chinese, "Chinese classics" has inherited its traditional senses from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absorbed new senses from Japanese as well. The coinage "Chinese classics" not only refers to the traditional history,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of Confucian classics, but also contains Sutra, Buddhist books, books copied on silk, bamboo or wooden slips, inscriptions, and hymn texts written on pictures. Nowadays, in their study on "Overseas Chinese classics", researchers have come up with their own definitions, some of which are rather casual, resulting in confusion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lassics". If "Chinese classics" are the crystalliz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Overseas Chinese classics" should be defined as books written in Chinese but published outside China, which reflect the wisdom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that of foreigners as well. They are cultural innovations inspired by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form a unique East Asian civilization landscape characterized as "harmony without sameness".

Key words: the Book Road; Japanese-Coined Chinese words; harmony without sameness;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ed in Japan; "Overseas Chinese classics"

以汉唐为标志的中国文化曾经惠及四邻、泽被东亚,由民族文化发展为区域文化乃至国际文化。时逢中华民族崛起之盛世,际会传统文化复兴之佳季,追寻汉风唐韵之海外流绪,大致可分三个层次:(1)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2)中国文化对域外文化的影响;(3)中国文化激发域外文化的创新。中国文化对域外的影响由衣裳而化为肌肤,再溶为骨骼与血肉,是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历程[①]。因之,我们的研究不能浅尝辄止,停留在第一层次,或踌躇于第二层次,应该深入至第

① 周作人在《日本的衣食住》中说:“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地空假,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意指文化的影响由表及里,分为多个层次。参见周作人《苦竹杂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三层次，最大限度地拓展中国文化的国际化意蕴。本文从“汉籍”的词汇考源入手，考察中国典籍流播东亚并激发周边地区模仿与创新的机制，从而催生“域外汉籍”诞生这一文化交流现象。

一、书籍之路

大而言之，中国文化包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前者以丝绸为典型标志，在东西方之间架构起“丝绸之路”；后者以书籍为主要载体，在东亚地区开辟出“书籍之路”。尤其在中日之间，由于大海阻隔和官方交通短暂，近代以前人员往来极度稀少，书籍遂成为日本汲取中国文化的主要媒介[1]。

以书籍为主线追踪中日文化交流史事，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做了大量前期工作。比如，北京大学严绍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 2007 年版，获教育部第五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搜括日本所存的中国古籍万余种，属于第一层次经典；再如，王勇主编的《中日汉籍交流史论》（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获教育部首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考索中国典籍对日本的多维影响，归为第二层次作品。至于第三层次，虽然日本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历代学人用汉文撰写了大量书籍，其总量或以万计，却尚未见规范整理和系统研究①。

中外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显示，书籍之路并非中国文化一味输出的单行道。五代开始的“佚书回流”证明这是一条互有往来的双通道，倘若以东亚视域来考察，或许称之为“环流”更为贴切[2]130-171。亦即在东亚区域内，书籍交流呈现循环往复、纵横交错的多层次立体样态。进而言之，文化交流的真谛不仅在于传播的广度，更体现在影响的深度。以书籍为例，域外人士通过阅读中国典籍而受其熏陶或获得灵感，遂激发模仿与创新的欲念，取范汉文形式以吐露本民族心声，营造出崭新的文明景观。这既是书籍之路在空间的拓伸，也是中国文化国际化意蕴的展现。近年“域外汉籍”研究的勃兴，说明学界开始关注这一领域。

二、域外汉籍

“域外汉籍”研究的兴起至今不过三十年。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台湾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多次举办“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②。此开风气之先，“以往汉学家们不曾注意，或是根本生疏的”[3]2 领域，逐渐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这一时期台湾学者开拓甚勤，造势最力。如林明德编《韩国汉文小说全集》（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1980 年版），陈庆浩、王三庆编《越南汉文小说丛刊》（法国远东学院 1987 年版），加上其后王三庆编《日本汉文小说丛刊》（学生书局 2003 年版），为“域外汉文小说”研究奠定了基础。

大陆方面虽起步稍晚，但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迎头追赶，推出一系列原创成果，此为第一期；进入 21 世纪呈后来居上之势，无论研究思路抑或涉猎范围以及成果数量和质量，逐渐占据中心并引领学界潮流，是为第二期。下面依次简述之。

先看第一期。1989 年杭州大学成立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重点定位于“以书籍为纽带的中日文化交流”。1990 年出版的陆坚、王勇主编的《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提出了汉籍研究三要素，即海外佚书、中国典籍的影响、域外典籍[4]。1992 年出版的王勇主编的《中日汉籍交流史论》倡导“汉籍宏观研究”，设“汉籍宏观研究鸟瞰”专章探讨日本的汉文典籍[5]1-13；1997 年王宝平出版《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收录总数达 2 671 种，基本网罗了留存中国的日本汉籍[6]；2004 年王

① 日本人历代用汉语撰著的书籍，据日本二松学舍大学“日本汉文学研究”国家基地统计，仅江户时代（1603—1868）就有约四千种，从 6—20 世纪的约 1500 年间，推测现存汉文书籍总量会超过一万种。

② 有关前五届会议的概况，可参见陈捷《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述略》，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 年第 1 期，第125－127页。

勇主持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项目“中国翻刻的日本汉籍”,成果汇编成《中国馆藏华刻本目录》(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项目最终成果报告,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2005年印制),收录376种。在此基础上,王勇提出“书籍之路”构想,力图构建东亚文化交流新模式。

再看第二期。2000年南京大学成立域外汉籍研究所,自2005年张伯伟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集刊》陆续问世,把域外汉籍研究推向一个高潮。会议方面,2006年浙江工商大学与日本二松学舍大学“日本汉文学研究”国家基地联袂举办“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韩国、美国、英国、比利时、泰国、越南的国外学者达41名,“域外汉籍”是会议热点之一;2007年南京大学召开“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八十余名学者汇聚一堂,探讨涉及“域外汉籍”方方面面的问题。项目方面,2002年上海师范大学孙逊领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域外汉文小说整理与研究”,2006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主持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工程。文献整理方面,2008年人民出版社与西南师大出版社联手打造《域外汉籍珍本文库》,201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2011年《域外汉文小说大系》、《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分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研究著作方面,王晓平著《亚洲汉文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王勇等著《中日“书籍之路”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吕浩著《篆隶万象名义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金成宇著《域外汉籍丛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张伯伟著《东亚汉籍研究论集》(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7年版)、王勇编《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等先后问世。

由此可知,域外汉籍研究发轫于台湾而盛行于大陆,由小说为主而扩展至经史子集,从学术兴趣而提升至国家行为,从而催生出一门崭新的学科。

三、仁智各见

“域外汉籍”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虽然诞生伊始,但已呈显学之势。各路精英学术背景既不同,概念定义自相异。台湾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在1987年12月刊行的首届会议论文集中开宗明义地归纳会议的三个主题为:“(一)有关中国域外汉籍的流传、出版与版本等问题的;(二)有关中国域外汉籍现存情形与研究概况等问题的;(三)有关中国域外汉籍史料价值以及中国与亚洲各国当年关系等问题的。”[3]1 王勇于1990年撰写的《汉籍与汉字文化圈》一文对“域外汉籍”诠释如下:“汉字文化圈诸国在摄取和消化中国文化的同时,历代留下大量汉文典籍,这些出自域外人之手的汉籍,不断丰富着汉字文化的内涵。域外汉籍至今仍是一座有待发掘的宝库,其中蕴藏着令人惊叹的汉文化遗产……域外汉籍既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又与本土文化血肉相连,这无疑是汉籍研究的一个全新的领域。”[4]346

进入21世纪后,域外汉籍研究渐成气候,吸引各专业学者参与其中,尤其是文献学、历史学、文学等领域的学者,各自依托自身擅长的专业对“域外汉籍”作了独到的释义。如南京大学中文系张伯伟教授把域外汉籍概括为三类:“1.历史上域外人士用汉文书写的典籍,这些人包括朝鲜半岛、日本、琉球、越南、马来半岛等地的知识人,以及十七世纪以来欧美的传教士;2.中国汉文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比如大量现存的中国古籍的和刻本、朝鲜本、越南本等,以及许多域外人士对中国古籍的选本、注本和评本;3.流失在域外的中国汉文古籍。”[7]2 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持编撰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其《编纂凡例》也框定了三部分内容:(1)中国历史上流失到海外的汉文著述;(2)域外翻刻、整理、注释的汉文著作;(3)原采用汉字的国家和地区学人用汉文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①。

两相比较,虽然排列次序有所不同,“域外所存的中国典籍”、“域外刊刻抄写的中国典籍”属于基本相

① 具体参见钟楚《筚路蓝缕 初现岚光——〈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一辑)出版》,载《中国出版》2008年第12期,第63页。

同义项，而“域外人士撰写的汉文著作”则稍有不同，即《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的收录仅限于“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若从“域外汉籍”作为独立的学科、新辟的领域来考量，上述定义尚有值得商榷之处。

其一，“域外所存的中国典籍”。中国典籍至迟在两汉已然形成专学，从汉儒到宋学再朴学，数千年来师承有序；由校雠及训诂至考据，学风蔚然成型。这里所指的“域外”仅仅是个空间概念，以此类推的话，既然同一本书籍按收藏国而别为“日本汉籍”、“韩国汉籍”、“越南汉籍”等，那么是否也可按存放地区而分成“北京汉籍”、“浙江汉籍”、“福建汉籍”等等？窃以为同一种书因分置不同地域，不足于将其另立门户。而且我们知道，有些域外汉籍如静嘉堂的“皕宋楼”旧藏之类是近代甚至现代才作为商品流出海外的，作为“中国汉籍”研究才顺理成章。

其二，“域外刊刻抄写的中国典籍”。张伯伟提到包括“域外人士对中国古籍的选本、注本和评本”，《域外汉籍珍本文库》还增加了“注释”本，即所谓的和刻本、朝鲜本、越南本之类。据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中国典籍在日本刊刻分“和刻本”与“翻刻本”两种，原书的白文再刻本属翻刻本，再刻时添加训点、假名则为和刻本；再刻时添加的音符、旁批、头注等超过一定限度，或书名冠以“改订”、“增补”、“景印”之类，一概算作“日本汉籍”[8]。和刻本大抵居于中国汉籍与日本汉籍之间，据笔者经眼，有些冠以“景印”而归为“日本汉籍”者，本文一如原书；有些书名照旧而划入“和刻本”者，不仅增加序跋，甚至增删作品或添加图版。因此辨别困难，不妨单独立项为宜。

其三，“域外人士撰写的汉文著作”。张伯伟介绍说，日本学者往往将此类典籍称作“准汉籍”[7]2，然而这种说法在日本学术界并非主流。虽然有些熟悉中国文献学的学者把日本汉籍称作“准汉籍”以对应正统的中国汉籍；但也有些日本学者着眼于本土文化，将本国人士撰著的汉文书籍从文体上区分为“纯汉籍”与“准汉籍”，前者一依汉文规范，后者夹杂日语文法。在日本享誉汉学研究重镇的二松学舍大学，2004 年获准创建全国唯一的“日本汉文学研究”国家基地，其标志性成果是构建了“日本汉文文献目录”数据库，按“日本汉文”、“和刻本汉籍”、“准汉籍”分类，对“准汉籍”定义如下：“汉籍本文经日本人加工，从而改变了原本的形态……比之和刻本汉籍，日本人加工的痕迹尤为明显，所以更接近日本汉文”①。这大概是目前日本学术界最专业、最权威的定义。据此，“汉籍”与“日本汉文”是对应概念，“和刻本汉籍”类乎“汉籍”，“准汉籍”则接近“日本汉文”。至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所称域外汉籍限于“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从内容的角度看，数以万计的日本汉文典籍基本多属中日文化交融的结晶，欲分辨是否“与汉文化有关”几乎不太可能。

在上述三种“域外汉籍”中，张伯伟认为主体是第一类，即“域外人士用汉文撰写的各种思想、历史、文学、宗教、艺术等方面的典籍”[7]2，这也是笔者主张应该重点研究的第三层次。如果将留存海外的中国典籍比喻为“衣裳”，和刻本类乎“肌肤”，那么日本汉籍相当于“骨骼与血肉”——虽属日本土生土长，但隐藏着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

四、“汉籍”新释

如前所述，“域外所存的中国典籍”之“域外”是个空间定语，表示“汉籍”的存储地；“域外人士撰写的汉文著作”之“域外”是行为主语的一部分，表示“汉籍”创作者的国籍。前者重在“汉籍”，后者要在“域外”，两者不可等量齐观而置于同一平台。既然这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我们不妨在时空轴中为之重新诠释定义。

“域外汉籍”诞生不久，业外人士或许觉得陌生；至于“汉籍”两字，大概都耳熟能详。其实“汉籍”的古

① 此处所言“日本汉文”均为书籍体裁，所以等同于“日本汉籍”。详细内容请参见日本二松学舍大学“日本汉文学研究”国家基地官方网站：http://www.nishogakusha-kanbun.net/database/about.html。

义失传已久,而现在使用的概念有可能是近代舶来之物。笔者曾探其由来,先查《现代汉语词典》、《古汉语词典》,继翻《辞海》、《辞源》,再阅《中国古文献辞典》、《康熙字典》,均未见收录。追踪至《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版)、《中文大辞典》("中国文化研究所"1968年版),终于如愿以偿,但释义颇令人意外。如《汉语大词典》有两个释项:(1)汉代典籍;(2)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称中国汉文典籍。也就是说,"汉籍"的原意指汉代的典籍,犹如"唐诗"指唐代之诗、"宋词"称宋代之词,此处的"汉"是朝代名而非国家或民族名。《中文大辞典》在此义项引《宋书·历志》:"远考唐典,近征汉籍。"这是祖冲之上表文中的一段,以上古之"唐典"对应近代之"汉籍"。据笔者考索,最早的用例大概出自汉代扬雄《答刘歆书》:"其不劳戎马高车,令人君坐帏幕之中,知绝遐异俗之语,典流于昆嗣,言列于汉籍,诚雄心所绝极,至精之所想遘也夫。"①这个义项传承至唐宋,元明以后日渐式微,迨及近代而遭遗忘。

大略在古汉语"汉籍"逐渐消亡之际,日本词汇"汉籍"传入中国。推想开始仅在涉日人员等小范围流传,真正进入大众视野则是比较晚近的事了。如清人姚文栋在《答近出东洋古书问》中提到:日本富藏中国古书,"而明治维新以后,西学兴而汉籍替,世禄废而学士贫,将不能保其所有,其流落归于撕灭者,翘足可待也"[9]中卷,426。再如清末大儒章太炎在《文学略论》中责难日本学人读书偏颇:"日本人所读汉籍,仅《中庸》以后之书耳,魏晋盛唐之遗文,已多废阁。至于周秦两汉,则称道者绝少,虽或略观大意,训诂文义,一切未知,由其不通小学耳。"[9]下卷,392考两人行实,姚文栋1881年曾出使日本,章太炎自1899年多次东渡,他们以"汉籍"指称中国典籍,显然带着些日本学界的色彩。

在日本语境中,"汉籍"大致有以下几个义项:(1)相对"国书"(日本人撰写的书籍)而言,指中国人撰写的汉文典籍,这是狭义的;(2)相对"和书"(用假名撰写的书籍)而言,包括日本的汉文典籍,这是广义的;(3)相对"佛书"而言,指佛学以外的汉文书籍,尤其指儒学典籍。举例来说,日本人读"汉籍"多用长安一带的"汉音",诵"佛经"则多用江南一带的"吴音",两者泾渭分明,绝不混淆。

然而,这个词汇一旦在中国落地生根,马上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与日本"汉籍"的原意渐行渐远。姚文栋所言"汉籍",相对于"西学"著作;章太炎所言"汉籍",接着"彼论欧洲之文,则自可尔,而复持此以论汉文。吾汉人之不知文者,又取其言以相矜式,则未知汉文之所以为汉文也"文脉,也与西学相对。时至今日,中日两国学者聚集一堂谈论"汉籍",往往南辕北辙,甚至产生摩擦。

概言之,中国目前使用的"汉籍"既传承古汉语基因,又吸纳日语词血液,经扬弃而创制出一个新词——不仅包括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还涵盖佛经及章疏、变文之类,甚至有人建议将简帛、碑刻、尺牍、图赞之属,凡传递汉字文化信息之载体尽纳其中,以构建面向未来的新汉字文化圈。

"汉籍"从中国传播到东亚,又从域外回馈至中华,再经国内学者呵护,升华扩容为超越时空的新概念。如此环流吐纳而生生不息,中国文化的精髓在斯,东亚文化的真谛亦当在此。笔者在此建议,"汉籍"为不分时代、不别国籍、不拘种类、不囿内外之总称,中国人原创称"中国汉籍",日本人原创曰"日本汉籍",以此类推。由此,既可彰显中国文化普惠四邻之辉煌,亦可观摩东亚各国孜孜不倦之创意,庶几臻于"和而不同"之理想境界。

[参 考 文 献]

[1] 王勇:《"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试论东亚文化交流的独特模式》,《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第5-12页。[Wang Yong,"'The Silk Road' and 'The Book Road': A Unique Pattern of Cultural Exchange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5 (2003), pp.5-12.]

① 张震泽注释"言列于汉籍"云:"言:指《方言》。汉籍:汉廷典籍。按汉有石渠阁,为庋藏典籍之所。扬雄此书写于新莽元凤年间,不言新籍,而言汉籍,当有用意。"见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页。

[2] 王勇等：《中日“书籍之路”研究》，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年。[Wang Yong，et al，*Studies on the Sino-Japanese "Book Road"*，Beijing：Beijing Library Press，2003.]

[3] 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编：《第一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1987 年。[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the United Daily News Group (ed.)，*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 on the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ed outside China*，Taipei：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the United Daily News Group，1987.]

[4] 陆坚、王勇主编：《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 年。[Lu Jian & Wang Yong (eds.)，*The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Chinese Classics in Japan*，Hangzhou：Hangzhou University Press，1990.]

[5] 王勇主编：《中日汉籍交流史论》，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 年。[Wang Yong (ed.)，*A History of Book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Hangzhou：Hangzhou University Press，1992.]

[6] 王宝平主编：《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 年。[Wang Baoping (ed.)，*The Chinese Classics Written by Japanese in Chinese Library Collection*，Hangzhou：Hangzhou University Press，1997.]

[7] 张伯伟：《东亚汉籍研究论集》，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7 年。[Zhang Bowei，*Papers Written in East Asia on Chinese Classics*，Taipei：Taiwan University Press Center，2007.]

[8] 長澤規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東京：汲古書院，1986 年。[N.Kikuya，*Wakokubon Kanseki Bunrui Mokuroku*，Tokyo：Kyuko Shoin，1986.]

[9] 郑振铎编：《晚清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Zheng Zhenduo (ed.)，*Literary Selection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02.]

邮发代号：国内 32－35　国外 BM 372

欢迎订阅 2012 年《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是由教育部主管、浙江大学主办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是新闻出版总署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入选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华东地区优秀期刊、浙江期刊方阵“精优型”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历年来源期刊，并被国际重要检索机构美国《剑桥科学文摘》（CSA）、美国《乌利希期刊指南》及波兰《哥白尼索引》（IC）、美国 MLA 国际参考书目等收录。《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是全国最早采用“同行专家双向匿名审稿制”的学术期刊之一（1998），目前为双月刊（200 页），大 16 开本，逢单月 10 日出版，全年共 6 期，2012 年定价 45 元/期，270 元/年。

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编：310028
网址：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电子邮箱：zdxb_w@zju.edu.cn
电话：0571－88273210、88925616　　传真：0571－88273210